

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

德国大学与 大学学习

[德]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 著
张 弛 鄯海霞 耿益群 译
张斌贤 张 弛 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

DEGUO DAXUE YU DAXUE XUEXI

[德]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 著

张 弛 郝海霞 耿益群 译

张斌贤 张 弛 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 (德)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
张弛等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
ISBN 978-7-107-20816-4

I. 德…

II. ①包…②张…

III. 高等学校—研究—德国

IV. G64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6795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15.875

字数: 405 千字 印数: 0 001~3 000 册

ISBN 978-7-107-20816-4 定价: 29.70 元
G·1392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出版说明

教育经典是在教育史上具有影响力的权威性著作，是教育名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是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是教育思想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它们对当时及后来的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近 60 年来，一直重视教育科学研究，积极推动教育思想和学术成果的传播，策划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教育理论学术研究成果，包括一系列的外国教育经典名著，为服务教育、繁荣学术、积累文化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例如，20 世纪 80~90 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外国教育名著丛书》（38 种 44 册），主要收录了从古希腊时期到 20 世纪初叶的教育名著。它是新中国第一套比较全面系统介绍古往今来外国著名教育家代表作的丛书。这套丛书出版后在我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产生了十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多年来深受读者欢迎，至今仍在反复重印再版，有不少卷还被引进到台湾印行了繁体字版，成为广大教育科研人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及师范院校师生的必备书。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广大教师更加迫切需要了解世界教育发展史上丰富多彩的教育思想和波澜壮阔的教育实践，以从中吸取智慧和经验教训。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适应教育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要，为了继续向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从事教育专业研究和学习的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宝贵的学习资料和研究文献，我们在教

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又策划了《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本丛书已经被批准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本丛书重点收录20世纪初叶以来的世界教育名著，与《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凡《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已经收录的，本丛书不再收录。

本着取精用弘的原则，入选《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的著作都是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教育家的代表作，其中不少是首次介绍给我国读者。为了便于读者学习与阅读，我们特请译者或相关专家为每本书撰写前言或中译本序，对作者及其著作进行全面的导读性介绍；同时，每本书还附有作者照片插图及生平著述年表等。

编辑出版《汉译世界教育经典丛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欢迎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出版提出宝贵意见，以使之更臻完善。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年8月

中译本序

整整一百年前，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亦译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的《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英文译本出版。著名的教育学者 M. E. 萨德勒（Michael E. Sadler）和英文译者之一弗兰克·梯利（Frank Thilly）都为英文译本撰写了非常详尽和出色的序言。按理说，本书的中文译本无须再有序言。但是，翻译一部跨越三个世纪的外文著作似乎总得有些理由。

尽管早在 1909 年包尔生的名字就因为他的《伦理学体系》由蔡元培先生译成中文而为中国读者所熟知，^① 到 1986 年，滕大春先生和滕大生先生又合作翻译了他的《德国教育史》（该书原名为《德国教育的过去与现在》），但是，至少在中国教育界，对包尔生的了解并不多。原因似乎很简单。作为哲学家，包尔生不如康德、黑格尔以及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叔本华、尼采等人著名；而作为教育家，他的影响又难以与赫尔巴特、福禄培尔和斯普兰格、凯兴斯坦纳等相提并论。教育界的人士更多是把他作为了解德国教育历史的一个媒介，因此，只关注他所撰写的有关德国教育历史的著作而忽略了他本人。因此，有必要借这个机会对包尔生作简要的介绍。

1846 年 7 月 16 日，包尔生生于施莱斯维希（Schleswig）兰根霍恩（Langenhorn）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851～1862 年，他

① 蔡元培先生的译本主要根据日译本（日文本译者为蟹江义丸），并且只翻译了《伦理学体系》的第二编。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曾多次重印。1988 年，何怀宏、廖申白教授翻译了全本《伦理学体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主要在当地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863~1866年,包尔生进入阿尔托纳(Altona)文科中学学习。1866~1871年,他先后在埃尔兰根大学、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据包尔生自己回忆,他的父母最初是希望他学习神学,但他认为自己的兴趣更适合于学习哲学。^①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他成了著名哲学家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 1801—1887)最为杰出的学生。1875年,包尔生成为柏林大学私人讲师(private-docent);1878年,他担任柏林大学的哲学与教育学的编外教授(extraordinary professor);1896年,他继著名哲学家爱德华·蔡勒(Eduard Zeller, 1814—1908)成为柏林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包尔生任教柏林大学期间,该校正处于鼎盛时期,兰克(von Ranke)、蔡勒、狄尔泰(W. Dilthey)、赫尔姆霍兹(Helmholtz)等一批世界知名的学者齐聚一堂。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包尔生在德国乃至欧美学术界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他是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哲学家,他是19世纪末期德国“形而上学泛心论”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哲学导论》(1892年)到1929年已出至第42版。作为伦理学家,他的《伦理学体系》先后被译成英文、日文和中文等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教育家,包尔生的《德国教育史》、《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German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Study*)、《实科中学与人文陶冶》(*Das Realgymnasium und die Humanistische Bildung*, 1889年)等著作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

由于包尔生首先是哲学家、伦理学家,因此,他对教育问题以

^① Friedrich Paulsen, *An Autob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heodor Lorenz, New York: Morning Sid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8.

及教育史的探讨往往超出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的范畴，他把教育作为人类精神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把教育看作是人类精神和道德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德国教育史》、《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等著作，不仅在德国以及欧美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包尔生的《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就一直是对德国大学史感兴趣的人士首选的书目之一，在我国也是如此。国内大凡有关德国大学的论文或著作几乎都会或多或少地引用本书。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教育界历来严重缺乏精通德语的专业人才，以德语写成的论著大多难以为我国学者直接利用，因此，通常只能利用其他语言（主要为日语、俄语或英语）的译本。多年以来，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本书的英译本或其他英语著作中对本书的引用而接触到包尔生的这本名著的。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学者了解和研究德国大学史最为基本的资料来源之一。为使读者更为方便地使用包尔生的这本名著，2000年，我们即计划完整地翻译这本书的英译本（20世纪80年代初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室曾经翻译了本书英译本的部分章节作为内部交流资料）。但当我们开始将计划付诸实施时，却始终找不到完整的英译本。笔者曾经委托多位朋友在国内多所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反复查询，都未能找到它的下落。无奈之下，只好请远在美国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攻读博士学位的杜亮帮忙复印本书的英译本。借本书中文译本出版之际，我们向杜亮博士顺致衷心的感谢。

翻译这部跨越三个世纪的外文著作的最为重要的理由，实际上与一百年前本书英译本译者所说的非常相似。梯利在本书的英译者序中曾写道：“德国大学在世界教育中所占据的崇高地位，同时也由于包尔生教授所讨论问题具有的普遍性，因此使他的著作不仅对他的同胞，而且对来自任何地方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都具有阅读

价值。任何一个在大学运行当中担任某个角色的人，不管是校长、教授还是校务委员会的成员，都应当认真学习这本书；任何一个希望从自己的大学生活中取得最大收获的学生，也应当阅读这本书。本书所列的资料翔实，建议也非常务实，因此，对于所有真正渴望尽可能履行好与大学生活相关联的职责的人，肯定颇有助益。特别是处在转型时期的美国，这种渴望吸收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一切优点的愿望非常强烈（尽管这种愿望有不少不理智的和夸大的成分），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本书会为我们找到正确的道路提供帮助。”

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实际上也具有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强烈需要。为数众多的考察团、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论坛、大量的出版物以及日益增多的以国外高等教育为主题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都表明了这种“如饥似渴”的需要。但这些并不表明高等教育界已经真正明白了我们应当“学什么”和“怎么学”这两个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经常困扰我们的基本问题。

关于“学什么”这个问题，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界似乎已经比前人聪慧了许多，至少人们都在说，不仅要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成功做法，更要学习精神层面的先进经验。当然，要真正清楚哪些是属于器物层面、哪些属于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以及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学什么”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似乎比我们的前人更加狭隘甚至更加“偏执”。也许是因为中小学外语教学的科目安排使大多数中国教育界的学者和学生都只掌握英语一门外语，也许是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人们理所当然地都把目光聚焦在美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上。因此，所谓学习国外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成了学习美国经验的代名词。在笔者看来，

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甚至是危险）的现象。没有人会怀疑，美国的高等教育是非常发达的，它不仅培养了大批卓越的学者和各行各业优秀的专业人才，吸引了全世界10%以上的外国留学生，而且具有非常灵活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但是，美国的“个案”并不能消除现代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而多样性和多元化恰恰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动力。20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一边倒”曾经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在日益多元化的当今世界，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在“怎么学”这个问题上，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界同样存在着基本的缺陷。由于功利主义的盛行，我们对国外（包括美国）经验的态度日益实用主义，往往只关注“即时即刻”发生的事情，往往只关注事情的本身，而忽视事情的由来和原因。其结果是，学习、借鉴成了模仿。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曾经先后从英格兰、苏格兰、荷兰、法国等国家和地区汲取了非常多样化的营养。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前期，美国又把德国当成主要的学习对象。而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德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包含其中的基本原因，都是美国人关注的对象。不仅如此，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美国人经常会注意到德国高等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阅读本书英译本的两个序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理智的态度。我想，这对于我们如何学习国外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是更有意义的启发。这才是我们翻译本书的真正动机所在。

张斌贤

2008年10月

英译本序

在本书中，包尔生教授这位健在的德语国家高等教育史的最伟大权威，详述了德国大学的发展、结构、功能，以及它们与社会生活、与国家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本书为读者呈现的这么一幅关于德国大学的全面、客观、准确的图画，是其他著作所无法与之比肩的。它告诉读者：德国大学从怎样的源头，又经历了怎样的束缚与自由之间交替更迭的背景，才发展到它们当前所处的地位；德国大学在形成德意志民族、深化知识、维护思想自由等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德国大学教学的精神实质和方式；德国大学学生生活的状况和规范；德国大学学院的全貌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德国大学在保持学术独立与服从国家控制之间的两难处境；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清晰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由此，包尔生教授让我们了解到了有关德国大学内部运作的情况，德国目前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样的运作，而它们的研究工作也使得整个学术界获益。在德国，最著名的教授被尊称为“德意志的导师”（Preceptor Germaniae）。对于拥有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历史学家尼布尔、兰克、摩姆森，培养出自然科学杰出学生利比希、赫尔姆霍尔茨、菲尔霍等人的德国大学而言，称其为“导师辈出的沃土”实不为过。

德国大学之所以在科学上有卓越的表现，并且在德意志民族的思想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德国大学有着一代又一代的杰出教师，其中许多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整个国家的思想领袖，他们集思想者、研究者和讲授者于一身，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又使其与经过筛选的、正处在可塑性最强年龄阶

段的年轻一代保持直接的接触。其二，德国大学从政府那里得到了一定规模的财政支持，后者使它们能够抓住各种系统拓展知识的新的机遇——财政支持基于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即限制国家在思想活动上公共支出的经济是不良经济。其三，德国大学已经找寻到了实现思想自由的道路，根据大多数旁观者的判断，这就保证了大学作为科学机构的独立性，尽管政府对于大学选聘教授、使用资金以及各种类型的考试——入学考试或者进入专业领域的资格考试——都行使着控制权。以上三个因素都是德国大学取得成功所不可或缺的。教师的品质确保了大学的学术进步、影响力提升以及声誉的取得；政府的宽松与慷慨，则能够保证大学取得不断进行成就卓著的研究工作的各种机会。然而，如果国家没有逐渐认识到，没有自由和独立就不可能有崭新和现实的思想生活的话，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工作都是不会有所作为的。

但凡高校，成功的秘诀并非在于其组织形式，或法律地位，或经费来源——尽管这些对于它们的有效运转和未来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在于它们运作的精髓以及不成文的公共服务的传统。正是德国大学生活的内在传统——这是一种使其充满生机并左右其行动的精神——才是最值得我们研究学习的，最令我们仰慕的。德国大学由于对科学的孜孜以求，对教育力量的坚信，对思想自由的坚决维护，同时又具有一种服从国家需要的自觉意识，而变得十分强大，卓尔不群。

包尔生教授的这部著作，最初是为德国读者写的，现在才被译成英文，尽管如此，它还是会证明自身在更大范围内所具有的实践价值。如今大学研究中的国际联系是16世纪以来最为密切的，任何一个考虑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德国大学一员的英国或美国的学生，都会发现这本书对他很有帮助。不仅如此，由于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也为了适应政府管理、产业发展以及规范城乡生活等方面对科

学发展的需求，在英国——美国也是一样——大学都正在经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我们并不久远的教育史上，德国在组织精神活动方面的经验还从没有如此贴近过我们的需要。我们发现，德国的大学和技术高中在很长时间里所经历的一切，说明了科学研究对于工业企业、对于国家福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看到，德国的经验能够指导我们——无论是作为警示还是榜样——正确处理大学与为其提供越来越多资源的政府以及其他公共团体之间的关系。一旦我们开始考虑挖掘国家理智力量的真正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在把大量的公共资金投入到了高等教育以及自由的科学探究工作方面，开先河者正是德国。普鲁士就是这样一个榜样。正是在被拿破仑打败处于自己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时，普鲁士创建了柏林大学。此举源于这样一个信念，正如洪堡所说：“就如同公民个人一样，国家如果能够在处于逆境时竭其所能面向未来创建某些东西，那么其作为就是非常明智的。”从如今所享有的财富中——人们将不会忘记，这些财富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科学工作者的劳动和整个国家的经济成就，而这其中大学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德国颇有远见地拿出了相当部分来保证和扩充为其创造了财富的科学资源。

在本书中，除了部分所附参考资料外，包尔生教授并没有致力于德国大学与英国大学的组织和运作的比较研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便不考虑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迥然不同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系统具有包容性，而德国则是基本同质的。如果从它们的内在组织来看，柏林大学与哥廷根大学之间的差异，就不如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之间的差异那么大，也不像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伯明翰大学之间那么千差万别。

假若我们问，在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之间的差异当中，什么是最

值得关注的差异时，答案并非简单地归结为大学与政府关系不同，是否采用学院制，或者专业教学与指导教学的相对重要性不同，大学学习相关考试的影响，等等。德国的大学是国家的机构，是由政府建立、维持和管理的（由于习俗的影响，政府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对大学进行限制）。然而，尽管在我们的实践中，政府并不太多直接地对学术任职进行干预，但就此把英国的大学描述成国家不闻不问的自治法人团体却并不准确。牛津和剑桥及其所属学院都是在学校章程下运作的，而学校章程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议会可以在任何时候——只要它愿意——决定扩大自身的控制权去干预它们的事务。而差不多所有的其他英国大学，每年都要由国家拨款，并且要定期接受视察以保证拨款的用途正当。还有，德国大学实行住校，但却并不是学院制。而如果将英国的整个大学系统的组织特征描述为学院制，也是不确切的。我们的新兴大学更加接近于德国大学，而不是传统的英国大学。另外，集中在各学院教授会的德国大学教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发挥着主要管理作用。但在大多数的英国大学（牛津、剑桥也是如此），却是在某些重要的系科中才是这样。还有，德国大学的学术考试不像英国大学那么重要，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公务员考试以及专业入门考试，却占据了德国大学生生活的大多数时光，甚至会影响他们是否选择攻读学位，而这一点在英国似乎还并不十分明显。

德国大学与英国大学的本质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组织形式，还不如说在于精神，在于知识观。在进行比照后有三点差异就会跃然而出。其一，德国的大学生不像英国学生那样对某一所大学那么有归属感。在德国学生的大学生活期间，他们常常会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而英国的学生，根据规定，他一旦入学，就必须同一所大学里完成本科学习。其二，尽管德国在近三十年来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德国大学从传统中继承的有关科学研究的精神仍然要比

英国大学所继承的博大得多。经过长期的教育，德意志民族成为了笃信科学的民族。而产生了多个伟大发现者和实验者的英国，却是刚刚开始认识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德国与英国大学各自颇具特色的、对于科学研究的不同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两国在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尽管德国的高中非常强调“全面陶冶”(*allgemeine bildung*)的培养，德国人却比英国人更习惯于朝成为一名专家的方向努力。在德国，有学科专长是一件比在英国更荣耀、有更多回报的事情。不管是好是坏（哪方面的理由就让人印象深刻），专家之于他们都要比之于我们更为重要一些。德国的行政管理胜在实施简约、专家式的控制上。但这样的话，一个平常人就很少有机会承担领导职责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缺陷，同时也享受着由自身不足带来的优势。从某些观点来看，英国也许是一个不成熟的国家，但它却还是一个头脑清醒、有着良好判断力的国家。其三，尽管德国学生的爱国情感并不比英国人更深，但他们却有着更加强烈的直接报效国家的意识。他们通过国家的传统，通过更加广泛的公务范围（包括大学以及各层次学校的教师职业），尤其是通过履行兵役义务——在包尔生教授看来，服兵役过程中强调的个人纪律，弥补了大学学习对其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感受到了这一点。

上述这些就是德、英大学的主要不同之处。但是，在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组织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明显区别。先不论褒贬，德国的高中教育系统的确要比我们更具有标准化的特点，这一点对大学的预科阶段带来了影响。可以想见，一个普通的德国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他就已经在高中对某个领域的专门学科进行了学习。而我们英国的中学，各校的毕业生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而且对那些充满阳光、心态良好但却懵懂无知的学生是比较宽容的，相比之下德国的教育系统更吝于使用低层次的智力材料，另一方面，它的组

织化程度又非常高，所以为个性发挥所提供的余地十分有限，并且在其清规戒律的压力之下，一些率真的思想很容易就过早地被扼杀掉了。德国技术高中的组织体系是与大学相脱节的，这是让包尔生教授唯一觉得遗憾但又认为很难纠正的地方。相反在英国，高等技术教育却已经成为大学职能的组成部分（也有少数几个例外）。现在立即就要对两种高等教育体系的相对优势作出判断，可能太过仓促了。德国人在技术教育领域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积累，而且在大多数的高等技术教育系科也都处在较我们更为先进的水平上。在德国技术高中重要性日益提高的时候，是德国的社会和学术传统使得高等技术教育与较传统的大学教育有了楚河汉界的区分。在英国，由于大多数大学都是新建的且更具可塑性，因而就避免了这种区分。然而，一考虑到这个方面的问题，有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德国单列的高等技术教育组织体系，激发了其他国家发展高等技术教育的勇气；同时它也确保了与实践的紧密联系，而这是德国大学的传统环境所难以做到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差异。英国一些大的行政机构，如伦敦县议会以及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利兹和谢菲尔德等地的市议会，已经在新兴大学机构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让人不禁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地方行政当局新建大学的热情，而在现代德国的学术发展中却似乎不存在相对应的情况。而且，英国大学在有关财产和经费事务方面也被赋予了比德国大学更大的自治权。这带来了一个双重结果。英国大学有着更为强烈的独立法人统一体的意识，但与德国大学相比，它们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生意上面，这种状态不利于集中精力进行科学研究，尽管这有助于丰富有关人本身的知识。还有，在牛津、剑桥，一种特殊形式的学院生活形式和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学院的权利或责任，的确消解了很多可能会强化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活力的能量，并且，学院的生活

标准也增加了大多数牛津、剑桥本科生的大学学习成本（尽管绝非所有人都是这样）。然而，另一方面，学院生活将不同类型的人以高质量自由交往的方式集合在一起，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是不会希望放弃它的，而会将其作为英国大学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因素。

本书读者会了解到，许多德国人在颇为他们大学的伟大和思想活力而自豪的同时，也希望看到大学运转的状况和组织发生某些变化。他们非常渴望在他们中学的高年级阶段能够保证更多的个人学习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国家考试对于学术研究，以及非常规思维的智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技术高中与大学的脱节感到遗憾，认为需要提供更多的奖学金使穷人能够到大学学习，进而能够从事一项自由职业。他们希望在大学能够建立起类似导师制的制度，作为对教授教学工作的补充。他们对在大学里建造学生宿舍（halls of residence）来替代散落分布的房舍（lodgings）表示欢迎。同时，他们还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高度组织化的受国家资助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制度，使得各种专业人才供过于求。

而我们在英国却感觉到，由于许多较差的中学缺乏一个较高的智力标准，而越来越成为妨碍这个国家前进的阻力。我们认识到，在对枯燥但系统研究成果的崇尚方面，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对科学精确性价值的推崇方面，都远远地落后于德国。除了要大力进行这方面的倡导鼓励之外，我们怀疑我们离那一天还是很遥远的：国家通过充分鼓励研究工作，通过使我们本地中学的教师职业成为对于那些具备文化涵养和实践能力的人具有很强吸引力的职业，从而有力地把握住国家高等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

有人说在教育领域的真理就存在于德国制度与英国制度之间。每个国家都可以从对方的经验和观点中学到很多东西。两个国家都些许意识到了，并且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有点勉强地承认了这样一个